

楚辞二十讲

梁启超 王国维等 著 胡晓明 选编



伟大传统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华夏出版社

伟大传统

楚辞二十讲

梁启超 王国维等 著

胡晓明 选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二十讲/梁启超等著;胡晓明选编.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3
(伟大传统)

ISBN 978-7-5080-5070-6

I. 楚… II. ①梁…②胡… III. 楚辞—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3375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伟大传统: 楚辞二十讲

著 者: 梁启超 王国维等

选 编 者: 胡晓明

责任编辑: 林媛韡

本书责编: 逸 井

特约编辑: 王慧川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封面构图: 沈继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787×1092

印 张: 26

字 数: 336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5070-6

定 价: 34.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策划者言

“传统”无疑是一个蕴涵着情感力量与神圣感召力的字眼。即使是在我们义无反顾地以加速度的姿态,不计成败地奔向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乃至后后……现代的今天,提及它,依然能够触及灵魂般地打动我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部分。就像决绝离家出门远行去闯荡天下的浪子,在疲累的途中偶尔歇息之际,或者在一个喧嚣散尽的夜晚蓦然回首时分,尽管触手繁华,远方的诱惑依然精彩,但那一刻他最思念的,却是那个我们由此出发、愈行愈远的家。

自1840年那个转换的年份以来,中国文化整体上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峻急与悲凉这两种看似相反却适相成的色调。“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唯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钱穆《国学概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急迫的救亡与启蒙,使得人们在不断地求变与重建中难以真正安顿自己的身心。而屡次遭遇的挫折,与围绕民族/世界、东方/西方、物质/精神、物/心、器物救国/制度救国/文化救国等多种尖锐的冲突在古今中西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求索,又在心底催生起无尽的悲凉,正所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生逢斯时斯世,在过去很多年里,国人的求索豁显了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伤害了更多的东西,其中,我们伟大的传统成了受创至为深痛的东西。以至于当我们对传统的评价仍然欲说还休时,传统文化的大面积流失却早已凸显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而更为深切的

感受是，简单地抛弃传统的行囊并没有让我们享受到想象中的轻松，反而使“何以安身立命”成为一个焦虑至极的问题。而不知道幸运抑或不幸，到今天，当“国学热”、“读经热”在商业大潮中悄然兴起的时候，“传统”已经成了一处被各种理论、学说、话语、流派与主义包围、冲刷、纠缠与撕扯的中心地带。出于各种复杂化的处理，使得我们逐渐忘记了赖以生存的传统究竟为何物，因此也就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她。对血液一样流淌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我们已经极度陌生，甚至视而不见。

拂开来路上无尽的喧哗与浮躁，站在新时代清明开阔的舞台，当中国的经济建设渐入佳境，进行文化再造，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时，对于传统，我们更需要做的，也许就是在温情与敬意之中“老生常谈”，“接着讲”那些我们习惯于忽略或误读的常识：

——传统不是过时的死的东西，而是永恒的活的东西；现代化并不是反传统，而是传统的自觉更新。甘阳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一文，也许仍有重温的意义。他批评了将传统视为僵死固定的现成之物，将“继承传统成了复制过去，光大传统也无非加大投影”的传统观。他认为，“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或说可能世界。因此，“继承发扬”传统就绝不仅仅只是复制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恰恰是要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创造出过去从未存在过的东西。

——传统是一种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存在。“物相杂，故曰文。”传统之所以蕴涵神圣的力量，就在于她的多资多源而不是定于一尊，就在于她的相互激荡而不是沉寂无声。“其真能于思想上

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陈寅恪语）这是哲人的彻悟，也是我们对待传统与新知需要明确的态度。

——传统是需要不断叙述与呵护的。“三代穿衣，五代吃饭。”希尔斯说，从操作意义上来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就可以看做是传统。他同时还强调，对传统而言，“增添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传统”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她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的接续与传承息息相关。余英时曾经总结一代大儒钱穆终生著述目的之所在，就是立志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我们无法企及每一个人都达至这样的文化高度，但出版的使命就是为了实现人们“共同的完善”而尽自己的本分。每一个以出版为志业的人，都应该为疗救这个时代的病症而努力。要勇于担当，并且能够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赋予我们的责任。

.....

正是出于上述的理由与信念，我们推出了这套“伟大传统”丛书。

文化建设是一个濡化而非革命的过程。出于平实而非高调的态度，我们以一种整理而非原创的方式来展现我们的“伟大传统”，尤其是将近百年来哲人智者对待传统的谠言慧语重新提出，放在读者诸君面前，以期用心聆听、咀嚼与回应。当中国的崛起开始以生产力增长为特征转化为以文化力增长为特征时，出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的文化再造和学术建设。抬头看山，路在脚下。用心梳理、了解与接续传统，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

我们无法一时全景式地打开中华伟大传统的视窗，但我们希望能够触及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最为精彩的人文风景。因此，在这个丛书之下我们推出了关于儒、道、佛的二十讲；关于中华文化轴心时代的元典精神如《论语》、孟子、孙子等二十讲；关于中华文化精神的代表性风景，如《楚辞》、《诗经》、魏晋人物的二十讲。至于筹划之中的，还包括器物等层面的二十讲。希望能够逐渐让我们的视野开阔起来，层次丰富起来。

庭院深深，我们无法通过有限的“二十讲”尽览伟大传统的幽深风景，但我们希望充当一个尽职合格的导游，由此导引读者走进传统文化的家园，进而自己去寻幽探胜，而不仅仅停留在欣赏传统文化的风景说明书上。

.....

漫步在中华历史丰饶的田野，传统文化的巡礼无疑是一种无上的愉悦。心存感恩，此时此刻，我们提醒自己：“慢慢走，欣赏啊！”现代人走得太快了，是会丢失灵魂的。

屈子之自沉心事及其文化意蕴（代序）

关于屈子自沉的具体时间，是多年来聚讼纷纭的一个学术疑案。据不完全统计，歧说多达十五种以上^①。学案的澄清与最终史志的真相，仍有待于冷静细密的考证与新材料的进一步发现。但是本文认为，屈子自沉之具体时间，并不等于屈子自沉之原因，前者与后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因为屈子自沉的原因，最基本的说明材料，是屈子诗歌中所表现的全部人格，以及屈子表明其死志的全部文献。即前人所谓：“求《楚辞》于注家，不若求之于史传；求之于史传，不若求之于本辞为确也。”（清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序》）屈子自沉的具体时间，或有待于读者知性的精细与求真的态度，而屈子自沉之原因，则更有待于读者心灵的照察。盖屈子自沉之心事，极简单明了，又极复杂纠缠。简单，可一言以蔽之曰殉国；复杂，则可具有多层阐释性及文化意蕴。本文的宗旨，是深入了解屈子不仅作为一个诗人，更作为一个仁人志士的品格因素，由此进而阐明屈子自沉之主要心理动因，以及屈子之自沉在中国文化思想传统中的典型意义。我的愿望，是为读者尽可能提供真实、充分、多层的背景材料，至于本文的结论，只是一家之言而已。读者对屈子之人格与思想之了解，终究只能取决于读者之心灵与千百斯年前另一颗心灵的真实照面。

^① 参见廖化津《屈原自沉考》，《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1月；赵沛霖《近年来屈原生平研究述评》，《锦州师院学报》1984年4月。

屈子对南方学派的叛逆与对北方学派的继承

屈子最根本的精神，是“国身通一”的精神。仅此一项，即已突出体现了他从南方文化的叛逆中，自觉皈依北方中原文化的人格结晶，同时也体现出，他是转化南方文化传统的巫风神鬼色彩与冷性品质，重新灌注理性生命灵魂的南方文化复兴者。

“国身通一”，作为屈子文学的核心思想，其意义是，诗人首先是一个志士，以一己生命通于民族、国家大生命。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诗大序》说：“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中原儒家思想，虽以“天下之道”，重于一国一姓之利益；但亦表明诗人首先应是担当民族国家兴亡重任的志士。屈子说：“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又说：“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九章·橘颂》）正是“国身通一”。其自传式的代表作品《离骚》，既是他个人的生命史，又是他命运相连的楚国国史。而南方文化的核心思想，却是“国”与“身”打成两截的。南方荆楚文化的代表人物，道家有老子、老莱子、文子、蜎子、鶡冠子、长卢子；农家有许行；天文家如唐昧；兵家如范蠡、大夫种；阴阳家如南公；杂家如尸子、陈良等，儒家人物几乎没有^①。这批代表人物，有两个特点。一是“楚材晋用”（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如百里奚霸秦，伍子胥霸吴，大夫种霸越，在楚国之外的其他地方，成就了功名事业。甚者如伍子胥，因

^① 参见饶宗颐《荆楚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二分册，台北，1970年。

不为楚平王所容而出奔吴国，辅佐吴王“破强楚”，吴兵攻入楚都时，竟掘开平王坟墓鞭尸，最是所谓“楚材晋用”的典型例子。屈子之生命精神形态，已与他的这些先辈文化名人大异其趣。清人刘梦鸥说：“屈子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死而不以自悔，中有所不忍故也。……竟报复之私情，鲜忠孝之至性，予于申包子胥无取焉。”（《楚辞章句序》）二是“冷性品质”。因为道家人物楚产最夥。庄子虽宋蒙县人，大半生的活动乃在楚地，亦可算南方荆楚文化的代表人物。道家文化是南方文化的精英，与北方中原文化最大的不同，即避世与游世的人生态度。老子是最明显的代表。与屈子同是南方人，同是史官，也同样受巫文化的熏陶，也写了五千言的诗歌哲学，但是老子却那么冷静，屈子却那么热情。老子终于骑着毛驴，顺着流沙河之西走了，屈子却抱石沉江。如何解释？至少可以说，屈子背叛了南方文化，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文中，称南方学派为“冷性派”、“个人派”、“遁世派”，“知实践之不可为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豁然自得以没齿者矣”。又称北方学派为“热情派”、“国家派”、“入世派”，“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当时之社会争”，“而屈子南人而学北方学者也”，“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所以有最诚挚深遂之情感为之素地，所以能成就一伟大的诗人。静安此文撰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短短三千余字，虽不无可商之处，但今天读来依然大体识力精湛。近年来的楚辞学人尽管费了许大力气与篇幅，畅论所谓“四方百族”、“西流东流”的文化聚合效应，尽管对于楚文化的研究开发大有深入，然而与王氏的论断相比较而言，在识力上仍差了一大截。可以说是拆碎下来不成片断了。

屈子作为南方学派的叛逆者，首先即背叛、放弃南方学派中的冷性的、避世的人生态度，而以一种炽热的生命气质，酷爱自己的宗族祖国。就此而论，他很像为行道而四出奔走、“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的孔子。孔子有一回到楚国，遇见一狂人，狂人在孔子面前唱了一支歌：

已乎！已乎！	算了吧！算了吧！
临人以德。	要待人和和气气。
殆乎！殆乎！	危险哪！危险哪！
画地而趋。	要照着地面上画的线走。
迷阳！迷阳！ ^①	装糊涂呀！装糊涂呀！
无伤吾行。	免得妨碍我走路。
吾行却曲。	走路要曲折。

楚狂之歌首见于《论语·微子》，又增写于《庄子·人间世》。极传神地唱出的“冷性派”对于“天下无道”的社会状况的一份无可奈何，与一份宽慰自解。我们听听屈子的歌吟：

饨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这里讲的“前圣”，即是中原儒家文化代表人物；这里讲的“志”、“道”、“死直”，亦是儒家基本价值观念。《九章》中有一篇《渔父》，司马迁说：“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现代学人有认为属实，有以为假托。然此一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渔父”所代表的精神，

^① 即“阳迷”；司马彪注：“佯狂。”（见《经典释文》引）

乃是一种冷性的人生态度，隐遁的避世精神。即便是屈子的假托，亦必然是以南楚习见的人物和典故为原型。总之，渔父与楚狂，皆南方学派的一种代表，可无疑矣。由此可见，屈子的精神生命形态，已与南方隐逸遁世之人士大不同了。至于说到他的作品中，所提到的圣人，有如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周文、周武；所提到的贤人则有如皋陶、挚说、彭咸、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奚、介之推；以及所提到的暴君则有如夏启、羿、浞、桀、纣，皆属北方学者常常提到，而南方学者所常称道的黄帝、广成等，屈子文学之中从不涉及。这亦是屈子思想根源之处学习北方文化的显证。

在“楚材晋用”的问题上，更可见出屈子国身通一的理念，完全超越了他的前辈名人。在《离骚》中，他曾假托灵氛之辞自遣自劝：“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实际上是借巫师的话，来倾诉他内心中“去”与“留”的矛盾。又曾假设另一个巫师巫咸的劝告：“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来说服自己采取灵氛的意见，选择一个吉日离开楚国。然而最终临行之时，依然不舍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在《九章》中，也表现了同样的情感冲突。如《惜诵》：

欲儵徊（低回）以千僚（逗留）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女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盖坚志而不忍。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

屈子为自己设计了三条道路，一是逗留，等候；二是远适他国；三是妄行违道（同流合污），三点他都做不到。在他的先辈如百里奚、伍子胥看来不值得痛苦徘徊之事，可是在他那里却造成难以排遣的心理焦虑。《橘颂》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

徙，更壹志兮。”他最终以其身体力行的生命实践，背叛了“楚材晋用”的南方知识分子传统。

屈子对北方学派的继承，即对中原儒家理性精神的继承。儒家最根本的思想，是人性善的思想，由此导出民本政治的基础。

《诗·烝民》产生于周宣王时代，是现存最早人性思想的原型^①。

《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表明人性本善；人性的本质，内在的是正直心、正义心。即孔子所说：

“人之生也直。”孟子所说：“人皆可以成尧舜。”屈子完全继承了这一份思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顼颔亦何伤”；“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他对于内在的善与美，何等珍视！儒家不仅泛指人性本善，更重君子修身进德。屈子可以说是以其生命人格，践履了儒家的这一思想。他常反求诸己：“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远游》）；他在生命困顿之境中，亦坚守修身之信念：“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涉江》），“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可见“好修”之执著，为屈子生命中一大事因缘。

“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最早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孔子以后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则与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密不可分。”^②这是与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

“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最早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孔子以后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则与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密不可分。”^②这是与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

“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最早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孔子以后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则与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密不可分。”^②这是与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

屈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原文化由宗教精神渐次僵化衰朽之际，嬗变为普世的道德精神。儒家远绍尧舜，近法文王周公，以其高明人格与德业功绩，创建民为邦本的制度与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治传

^① 关于《烝民》的成篇年代及思想内涵，参见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第235—236页，中国台北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统。这是由人性善的终极关怀而合乎逻辑地导出的政治精神。屈子完全倾心于此；其“美政”的基础亦由此而来。“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有此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陆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尤未悔。”（《离骚》）这是屈子表明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诗句。其中含义为：第一，屈子政治思想的统系，楚国理想政治的源头，乃在儒家所开示的禹汤文武周公的政统。正如刘梦鸥氏所说：“夫屈子之志，以谓忠君爱国，伤谗疾晨，宗臣义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怀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复致意，其孤怀独往，不复有春秋之宇宙也。”（《楚辞章句序》）第二，此一统系的核心价值，乃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乃在“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诗经》）。这表明屈子对儒家思想的实质，有根本的把握。第三，此一大段的前面，历数夏启、后羿、桀、纣等昏君、暴君亡国的史实，此一段之中，又特为提出古今成败之根本准则（“计极”，即“极则”，采游国恩说），乃在于行人道，即“善”与“义”，这是儒家大义中的“君权有限合法性”的思想的体现。这是屈子并非“愚忠”的有力证明。王逸注“夫孰非义而可用”二句，误指屈子意在指责“世之人臣”，这是王逸在汉代专制政治下，士人扭曲人格的思想烙印。后世注家如汪瑗等已纠驳之。^①第四，屈子末句所表达的择善固执、守死以道的精神，亦来自儒家的思想资源。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曾子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说：“志

① 参见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6页。

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尽心上》）；又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屈子的精神，正与儒家仁人志士精神为一。清人奚禄诒《楚辞详解序》云：“屈大夫非辞人也，王佐之才也。不幸生衰楚，不忍见其宗社之狐祥，自沉于汨。心比干之心，而道周公之道也。……其要旨归，六经之义遗焉。其上陈天道，函刚健中正之则。负宇负宙，旁通其情，则几于《易》者也。称先王，恤兆民，拨乱之意，归于仁义，则几于《书》者也。忧心忡忡，续四始五际之变，哀而不伤，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则几于《诗》者也。国之大事，居之以慎，伸君子、抑小人，比物类情，而志存乎经世，则几于《春秋》者也。放乎江介，过自检束，洁衣冠，尊瞻视，三纲九法，郁结于胸中，则几于《礼》者也。感物而动，声成文，律谐声，廉直遭杀之音，资于六气，则几于《乐》者也。”语虽有可商，然屈骚与六经相通，却是真实不虚。

屈子与北方学派的区别

楚王无道，国政昏暗，屈子早就该去，终不去；屈子早就该一死了之，终不死；要等到最后危急存亡的关头，他才死^①。屈子可以说是与宗国共存亡。楚国好比一只漏水的破船，残喘苟延于波涛四面的大海之中，有办法的人都逃走了，只剩下一个抱着桅杆不放的人，这就是屈子了。

屈子为何这样坚守，这样固执，这样迂拘不通？以生命来殉一个民族国家？他这种性格与南方学派中的人是大不同的，上文已经

^① 关于屈子自沉的原因，学界有“殉国说”、“被放说”、“殉君说”、“洁身说”、“尸谏说”，甚至“赐死说”。参见前揭廖化津《屈原自沉考》。本文肯定“殉国说”的大前提。

证明；但是可不可以说他完全受了北方学派的影响呢？在《离骚》中，屈子曾提到“比干”、“伯夷”、“叔齐”，作为他“伏清白以死直”的榜样。这些人物都是北方学派的儒家传统中的圣贤人物。然而屈子提出这样的人物乃是在忧谗畏讥的恶劣政治环境之中，表白自己愿为正直的理想、操守与恶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与勇气。《离骚》的写作心态，尚还未到殉国家殉民族必死的时候。

《离骚》作于他第一次遭放逐之时，屈子尚有一大事心缘未了。究其实，屈子性格中必死的悲剧性因素，虽与儒家前辈圣贤人物的精神感召有关系，虽与儒家守死善道的根本精神是相通的，但是仍然有另外的思想因素，是儒家思想所无法解释的，深究起来，甚至是与儒家某些基本观念不尽相符的，甚至跟儒家的根本精神尚有重大区别。这一点历来论屈子者皆未能仔细分析。

区别在于，儒家政治精神中的最高理念是“天下”观念；而屈子精神中的至高理念，则是“国身通一”的“道”。孔子奔走列国，栖栖遑遑，史称“干七十余君”（《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的是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而非一国一姓之兴亡。因而《论语·宪问》记，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能死君，孔子反赞其“仁”。孟子一生，由邹而齐而梁而滕，至老仍颠簸路途。因孟子极重一个“去”字。《孟子·离娄下》说：“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孟子·万章下》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之所以要强调“去”，一来为了凸显“士”的尊严，确立“帝王师”的身份意识；另一更根本的原因，乃是因为在孟子看来，宗国尚不足以殉身；宗国之上，尚有一更高贵的“天下”观念。孟子论伊尹之志，说：

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

所以，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意思是该去则去，不该去则不去。完全是发自本心的自由意志。“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结其身而已也。”（《孟子·万章上》）个人生命不仅仅止于个人，乃通于更大的一种理念。“非其道也，非其义也，禄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孔子孟子，可以说体现的是“道身通一”思想。个人生命不必止于一国一姓，应自任以天下之重，这就是屈子与儒家思想的区别了。所以我们要拈出“国身通一”一词，以表明屈子特出的文化渊源与特出的思想贡献。

这特出的思想渊源，古今学人中，姜亮夫先生考证最力。姜先生撰写了《说高阳》、《为屈子庚寅生日进一解》、《〈史记·屈原列传〉疏证》等楚辞学中里程碑性质的论文，从战国帛书、古地理文献等大量材料的整理中，渐渐梳理出较完整清晰的古史南楚宗族世系，以此一世系做背景，于是乎，《离骚》开篇屈子自叙身世的八句关键性句子，其所含有的重大意义，完全揭开了。屈子绝不同于后世文人自叙其身世的一种特殊心理，于是乎大大彰显。姜先生的结论，简言之，乃谓：“高阳”非屈姓一宗之主，乃整个楚民族之祖；屈子之血统，属楚族最高贵之血统；屈子之生日，又为楚人之所谓“三寅吉宜日”，为天降之高贵；屈子乃自春秋以来世守“莫敖”一重任之屈瑕之后代，此一重任，即楚之所谓“三公”，故屈子之身与国遂为一体而不可分。明乎此，屈子既以宗老而兼国老，则义当死社稷、忠大宗；明乎此，则屈子全部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国恋宗思想，乃至其所以不得不以一死以报宗国之结局，方有可说；而“三户亡秦”之民族品德，即由此一精神而发扬光大。姜先生的考证坚实精审，裁断明畅有力。有此一结论，上文所谓“别有一种思想渊源”，便有着落了。即屈子之思想性格，有一最深的生命根源，即宗族（国）与个人（身）打成一体，国亡，则个人生命